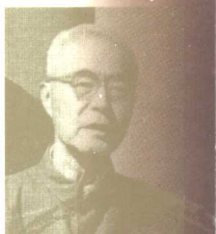


我与

古史辨



顾颉刚 著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

学者讲坛系列

名誉主编 王元化
主 编 吴 格

走向大学问家的思想深处

顾颉刚想
通过学术活动
来纠正对中国
过去的看法,整
理那些被他认
为有害于现代
中国之成长的
学术研究方面
的东西。



学者讲坛系列

名誉主编 王元化
主 编 吴 格

我与古史辨
顾颉刚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8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古史辨》/顾颉刚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故事会学者讲坛)

ISBN 7-5321-2036-8

I. 我… II. 顾… III. 古史辨-研究-文集 IV. K2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152 号

责任编辑:陈 征

封面设计:王志伟

我与《古史辨》

顾颉刚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375 插页 1 字数 143,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ISBN 7-5321-2036-8/I·1655 定价:10.00 元

出版说明

当前,中国书业可谓百花齐放,气象万千,图书的出版数量、规模、品种,正以惊人的指数率增长着。这对于有过“书荒记忆”的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然而,我们不无忧虑地看到,万里黄河,亦不免泥沙俱下。有些图书初进书市,便“爆”、“炒”之声不停,然终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泡沫”;有些图书为利润所驱,漫天要价,读者无奈之余,只好望“洋”浩叹;而有些图书甚至含有一定数量的“细菌”……有鉴于此,我们适时推出“故事会图书馆文库”,期望在中国图书界掀起一场“绿色革命”。

众所周知,《故事会》是一本面向广大群众,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又充盈时代气息的通俗性文学刊物。它清新刚健,情节曲折,口头性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每期都拥有一千万个海内外知音。本文库以“故事会”为名,意在继承《故事会》数十年“修辞立其诚”的优秀传统,把这项文化工程搞得扎扎实实,同时,也是想在以情节为主的故事文学的基础上,扩充《故事会》的广度,增加《故事会》的厚度,以及提升

《故事会》的高度。如果说,“故事会图书馆文库”因了《故事会》而受者众,那么《故事会》也会有了“文库”而传诸久远!

本文库第一次推出三个“藏书架”:“经典著作系列”(28种)、“学者讲坛系列”(10种)、“当代创作系列”(2种)。我们对收入“藏书架”的图书有个基准,那就是:一、凡称得上经典的,须由学者精心编选,入选者均应为世界大师的一流作品。二、学术之作,须经过一代或数代人的阅读检验,是谓“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三、创作作品,须有原创的个性,同时也要有社会性。四、收入文库的图书要体现价廉物美的风格,要确有保藏价值,并尽可能让读者少花钱。我们编辑此文库,其目的就在于让读者花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财力,精读一本好书,走近一个作家,了解一门学科。幸运的是,文坛耆老巴金、施蛰存,学界泰斗季羡林、王元化,非常重视这套文库的建设,并慨然应允担任文库的名誉主编。他们的智慧,应该说是本文库极大的财富。

莎士比亚曾说过,我的图书馆是我心仪的花园。在此,唯希望“故事会图书馆文库”能给广大读者带来一息生机、一缕清香和一脉绿色,诚心所愿!

上海文艺出版社

故事会图书馆文库编委会

编者的话

站在世纪门槛边的中国人,今天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胸怀,海纳百川,博取众长,向着二十一世纪迈进。回首百年风云,中国人在继承传统文化并汲取他民族文化精华以建设现代化的历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留下无数令人反思不已的话题。中国人,由于历史传统的厚重积淀,自从跨入近代以来,一直未免于步履蹒跚,进程迂缓;中国人,又由于百折不挠的坚毅自信,至终也不会甘于落后,放弃进步。溯自近代中西文化发生冲撞以来,无数有识之士,为了祖国的进步与昌盛,上下古今,八方求索,苦心研讨,著书立说,用以沾溉世人,启迪后学。回顾历史,我们固然常常涌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感喟;瞩目将来,又不能不时时记取先民“温故而知新”的教诲。

民族文化的形成,得自历史的积累;民族新文化的成长,同样有赖前赴后继的追求。中国人汲取他民族的文化精髓,并不始于今日;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雄视阔步,正是

凭藉着前人的开拓与经验。因此,在今天的“知新”,即学习他民族先进科技与文化的同时,切切不可忘却“温故”,即接受并借鉴前人的求索成果。漠视前人在继承传统与消化外来文化方面的已有成绩,凡事重“新”而厌“故”,将前人辛苦经营的文化遗产轻率弃置,实非明智者所当为。人类的经验与知识,固然在日日更新,但今日之“新”,何尝不会成为明日之“故”?而昨日之“故”,又何尝不能培育今日之“新”?在文化学术的领域里,有对先哲的充分敬意,有对前贤的虚心继承,才可称其能“温故”,也才可信其能“知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新故相循,生生不已,既是自然世界的法则,也是人类进步与文化发展的法则。

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当前的出版潮流中,既有志于为读者大量提供“知新”的读物,又有心于“温故”。现承命遴选前辈学者的传世佳作;重印以饷读者,征讨并及当代学人的未刊著述,新版以惠后学。入选各书,均诚邀专家,新撰导言,并辑作者简传附后,以为读者知人论世之助。因感主持人愿力之弘,用意之邃,故不辞溷陋,谬膺委任,幸赖师友关爱,勉强完命。因所选多为导人问学入门的小种著作,其中不乏前辈讲学之稿,故总冠以《学者讲坛》之名。编选之间,展诵多益,以己推人,如读者亦同感受益,更自荣幸。

一九九八年五月吴 格记于复旦园

探求治学方法的心路历程

顾 洪

《古史辨》是一部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考辨我国古代史料真伪、探究神话传说面目的论文总集，并由此产生了现代史学界的重要流派——古史辨派。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科学地审查中国古代传说的理论武器。

—

研究历史第一步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然而中国五千年漫长历史留下的史料已不多：“六经”以前不再有记载，三代足徵的文献所剩无几。疑古思想的出现与发展，正是与古史流传和古书形成这一漫长过程紧密相伴的。

孔子虽然“信而好古”，但“不语怪、力、乱、神”（《论

语·述而》),表明他在论说古史之前,已作了一番选择的工作。他在讲那些不属于“怪、力、乱、神”的传说时,也抱着不轻信的态度,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论语·八佾》)。可见他对传说的夏礼和殷礼,采取了审慎的存疑态度,认为只有在他们的后裔杞、宋二国那里,得到的文献才是可信的。因此,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开创了对古代传说考而后信的平实作风。

孔子的学生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即是说商纣王干的坏事不像传说的那么厉害,只因他处于亡国之君的地位,人们便把天下的坏事都归到他身上。这可视为辨伪史上的第一句话。口中常提“《诗》云”、“《书》曰”的孟子,也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孟子·尽心》)。凡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对事物做无条件的信仰。司马迁生于战国百家寓言之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写成中国第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著作《史记》,然而于帝王舍去伏羲、神农、燧人、有巢,于名人舍去许由、务光、列御寇,现在看似简单,在当时确实需要眼光和胆量。《泰誓》是汉武帝时新发现的一篇周初的书,并立于学官,东汉马融竟从古书中找出引用《泰誓》的话,都不见于这篇《泰誓》中,因而断定其为西汉时伪造,他的工作成为考据性辨伪的开端。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对于史学界权威作了不容情的批判,他不信古代记载完全真实,点破学术界所以不敢疑

古的心理是拘于礼法,限于师训。啖助治《春秋》,站在事实的基础上指出《左传》胜于《公》、《穀》,开了“《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的超家派的研究风气。柳宗元则用啖助的方法治诸子。

宋代发生的以新义解经的改注运动,其实质就是辨伪求真。因为重新注解,必然要对旧说作一番认真审查,使古史中的问题暴露出来。晁以道辨《尚书》今本与古本之异、辨《诗序》之妄,辨《穀梁》晚出,其书不传,洪迈《容斋三笔》中节录数语,并评之曰:“然则晁氏之于群经,可谓自信笃而不诡随者矣。”这句话概括了宋人的批评精神。在这种精神下,“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传耳剽,翕然成风。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司马光《论风俗札子》)。正可见北宋之世,疑古思潮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两宋时期辨伪的代表人物有欧阳修、郑樵、朱熹。欧阳修著有《易童子问》疑《十翼》,《诗本义》疑《诗序》并辨毛、郑《诗》说,《泰誓论》疑《尚书》,《请删定正义疏》疑唐人《正义》,还有辨《帝王世次图谱》、辨《石鼓文》等文字,惜今已不传。郑樵摒绝人事和科举,读书著作的范围从六经扩展到天文、语言、生物、医药等方面。他不信《易经》的《彖》《象》出于孔子而以为战国时的两家;不信《尔雅》出于周公而以为在《离骚》之后;不信石鼓是史籀所书而以为秦物;把《诗》放到声歌的地位,当作乐歌与乐府进行比较研究。朱熹

一方面是道统的继承者，另一方面又实事求是地对史料做审查。作《诗序辨说》揭发其违反《诗经》真意之处，作《孝经刊误》证明其中有许多抄自《左传》而又抄走样，必非孔子所说。朱熹又屡辨《古文尚书》，以犀利的眼光指出今古文的差异：“孔壁所出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他的学生蔡沈作《书集传》，遵其师意，在每篇下注明“古文、今文皆有”或“今文无、古文有”，使人了然于今、古文的区别。朱熹刊刻“四经”，把《易经》和《易传》分开，把《书经》和每篇序分开，把《诗经》和《诗序》分开，把《春秋》和《左传》分开。这样经归经，传归传，看似平常，却实在是他的历史观念的阐发，实质上把两周的史事、制度、学术与战国秦汉间所传的古史事、制度、学术区分开来，因而划出不同时代的文化分野。

明代宋濂作《诸子辨》、胡应麟作《四部正论》，但明代学风务博而荒，工作没有深入。

到了清初，顾炎武首起反对明代空疏学风，提倡读书结合实际，重创实学风气。此后阎若璩用毕生精力，写出《尚书古文疏证》，以读书必寻源头、判断必凭证据的态度，证明晚出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是东晋作品，把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宝典，尤其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尧、舜、禹相授之心法”拉下圣坛，堪称“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阎氏同时的姚际恒，以更大之范围、更彻底之态度，作

了百六十卷的《九经通论》，考辨出许多伪书、伪说，但因观点超前，为世难容，因而失传。随着清代汉学反宋学思潮的影响，学者们渐渐由整理古书到迷信汉儒，怀疑精神受到扼制。只有乾、嘉间与外界无甚往来的崔述，以毕生精力写成一部《考信录》，站在儒家立场上，以“考信于六艺”为标准，通过整理古代史实，揭露汉代所传先秦典籍中的谬妄。嘉庆以后，今古文问题被重新提起，疑古精神又得到复兴。刘逢禄作《左氏春秋考证》，从内容到传授系统证明《左传》与《春秋》是两部书。此外，龚自珍曾在文集中怀疑《左传》、《穀梁》、《周礼》等书。魏源作《诗古微》、《书古微》，廖平作《今古学考》、《古学考》，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也是同类著作。

纵观历史上疑古事、辨伪书的工作，可以看到，它萌发于战国、秦、汉而延续于唐、宋、元、明，到清代已趋成熟阶段。它是一道割不断的历史长流，也是祖国文化遗产中不容随意弃置的一部分。现代的疑古辨伪研究，正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其范围更大、工作更彻底。冯友兰曾说：“中国现在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古史辨》第六册《序》）。他将这三种趋势称为“三派”。其实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疑的前提是建立了信的标准，符合其标准者始信，反之则疑。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都各有其标准。而真古正是由疑古者整理发掘而来的。冯氏又说：“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

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同上)。很显然,冯氏划分疑、释两派是从史学研究分工的不同角度而言。近来有些人不得冯氏要旨,平面地加以套用,动辄以疑、释相区分,这从逻辑上很难说通。因为疑古本身就是一种释古,所以疑古与释古不可以绝对划分为两概(《读书》1997.8.《也谈“清华学派”》),依此推理,信古也是一种释古,疑与信是站在不同立场上解释古史,何由而来三派?另外,针对“《古史辨》的时代是过去了”的议论,顾颉刚先生批评说:“《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旧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做,《古史辨》只承接其流而已。至于没有考出结果来的,将来还得考,例如‘今古文问题’。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里说得到‘过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2.《我的治学计划》)

二

清代学者崔述在《补上古考信录》中说:“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超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又在《考信录提要》中说:“大抵古人多贵精,后人多尚博。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他看出古籍中所载古史愈后愈详的现象,但还不能确切阐明古史系统的层累现象。

本世纪二十年代,顾颉刚先生与胡适、钱玄同等人探讨古史和古书的真伪,提出战国、秦、汉以来古书所载的古史,大都出于神话传说的演变,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层层积累而造成的观点。他在1922年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即是说,出现越晚的神话传说,在古史系统里排的位置越靠前。1923年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前记”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即: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拿这些观点与崔氏的说法相比较,可以看出其中的变化。崔氏的说法虽含有层累造成的观念,却只描述了历来相传的古史系统的现象,先生的表述,以古帝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先后来比较,从而得出二者先后恰恰相反的结论。

又,崔氏运用汉学考据方法,遵循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信条。他只信从经书的记载,来驳斥诸子百家中的传说和神话。在这一点上,先生认为拿经书的话做标准,终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经书和传说没有截然不同的真伪区别,而只是时间先后的不同。他以历史进化论为依据,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条标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

黄金世界的观念。这四条标准,不仅超过了“考信于六艺”的标准,而且到今天都没有过时。近几十年来考古学的发展,证明了以往所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其他地区的文化只是在它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是不全面的,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明,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发展着,二者之间相互影响。杜正胜说:“借由各种文化类型的内涵,史家不但可以重建古代各地区的历史,也可以认识各族群的文化交流。”他把这比喻为“考古家送给古史学者的大礼物”(《考古》1992.4)。1996年第9期《读书》的考古笔谈中,陈星灿引了张光直一段话:“我们逐渐发现从我们几十代的老祖宗开始便受了周人的骗了,周人有文字流传下来,说中原是华夏,是文明,而中原的南北都是蛮夷,蛮夷没有留下文字给他们自己宣传,所以我们几十代的念书人就上了周人的一个大当,将华夷之辨作为传统上古史的一条金科玉律,一直到今天才从考古学上面恍然大悟。”其实早在七十年前,先生根据进化论的理论提出的“层累说”,就是向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可以说,他的推翻非信史的四条标准也经受住考古学结论的考验。

此后,先生又对伪古史系统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作了探索,认为在战国、秦、汉四百余年中,因等级的破坏,种族的混合,地域的扩张,大一统制度的规划,阴阳五行原理的信仰,出现了许多应时的学说,随之生出许多为证实这些学说而杜造的史事。例如尚贤故事就为适应士的阶级的需要,五德故事、分州故事、封禅故事、皇帝故

事等,就为适应帝王阶级的需要而产生。而把许多古代各族的帝王编排成的古史系统,就是由于种族的融合,把各族的祖先归到一条线上,把原有的横的系统变成了纵的系统而形成的。后来他深入研究战国、秦、汉的思想学术史,就是企图从中寻出当时人们的上古史观念与其所造作的历史的关系。先生曾在多处明确表示自己的理想,是作一位战国、秦、汉的思想学术史家;自己一生著述坚持不变的主题思想,即是对于战国、秦、汉时代学说之批判。这说明他穷究伪古史的决心和花费的工夫,大大超越了前辈辨伪学者。

先生利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证明历来公认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是由神话传说演化而来,从根本上推翻了二千年来人们崇信的偶像,是向世代相传的封建观念的有力挑战。因此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一发表,便引发了与守旧者之间的大论战,且得到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关注,从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所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不仅具有创造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反封建的社会意义。在古史大论战之后,伪古史系统终于瓦解,大多数学者把三皇五帝时代列入史前史的范围,黄帝、尧、舜为原始神话传说的人物,也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原来反对他的学者,后来也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如张荫麟后来著《中国史纲(上古编)》,也接受了三皇五帝是神话传说的看法。

当然,任何东西开始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先生这一史观其内容的表述还有不够完善之处,如层累与分化、演进

的关系等,还需要后来考辨古史的人继续充实和发展,但其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

三

以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疑古辨伪的业绩,在近代史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胡适称其为“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他的基本方法是不能推翻的,他的做学问的基本精神是永远不能埋没的”(《古史辨》第二册《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郭沫若称“层累说”“的确是一个卓识”,“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评价其学说“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现代史学的观念”,“顾先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许多外国学者如恒慕义(A. W. Hummel)、魏特夫(K. A. Wittfogel)、埃伯哈德(W. Eberhard)、顾立雅(H. G. Grell)、韦利(A. Weley)、拉铁摩尔(O. Lattimore)、休斯(E. R. Hughes)、高本汉(B. Karlgren)、卜德(D. Bodde)、诺亚费尔(Noah E. Fehi)、卫德明(H. Withelm)、格雷厄姆(A. C. Graham)等人,都受到他的影响,在研究中采用了他的观点和方法。《苏联历史百科全书》和《大英百科全书》(十五版)也有顾颉刚和《古史辨》的词条。七十年代初,美国又出版了施耐德(L. A. Schneider)系统研究顾颉刚及古史辨学派的专著《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